

我的香港

訪談這一代香港文化人

嚴飛 著

嚴飛問，

韓麗珠、袁兆昌、

潘詩韻、Stella So、

阿P、朱凱迪、

鄧正健

沈旭輝

作者 嚴飛
責任編輯 黃幗婷
美術設計 Ying Wong
封面書法 賣字
出版 文化工房
香港九龍青山道 505 號通源工業大廈 6 樓 C1 室
電話：5409 0460 傳真：3019 6230
網址：<http://clickpresshk.wordpress.com/>
電郵：clickpress@speedfax.net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三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台灣發行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20 臺北縣板橋市松柏街 65 號 5 樓
電話：02 2254 2899
出版日期 2014 年 7 月 初版
國際書號 978-988-13048-5-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釘裝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目次

代序・改變和尋求改變的下一代・梁文道	04
自序・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嚴飛	11
寫作的孤獨和自由・韓麗珠訪談	16
香港獨立出版，掙扎之下的理想主義・袁兆昌訪談	30
透過劇場創作去思考香港・潘詩韻訪談	48
有趣的事物，長出腳來遠走高飛・Stella So 訪談	72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阿 P 訪談	88
社會運動是介入政治的重要據點・朱凱迪訪談	102
社會批判下的香港棱角・鄧正健訪談	120
一個燦爛的異數・鄧小樺訪談	146
改變香港人的國際視野・沈旭輝訪談	166
守望新聞，「中生代」的香港夢想・張潔平訪談	180

我的香港

訪談這一代香港文化人

嚴飛 著

嚴飛問，

韓麗珠、袁兆昌、

潘詩韻、Stella So、

阿P、朱凱迪、

鄧正健

沈旭輝

通過訪談

韓麗珠、袁兆昌、潘詩韻、Stella So、阿P、

朱凱迪、鄧正健、鍾

反映這一代香港文化

展現他們在香港

政治衝鋒

抗爭和對抗

梁文道：

「我覺得這代人的特別之處就在於，一方面，他們會非常強調本土性地熱愛香港，但另一方面，他們的愛包含著很強烈的改變香港的願望，而這個改變是很徹底很根本的改變。因為這樣的改變是建立在之前他認為『香港是甚麼』這個問題基礎之上的，他們想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他們愛香港，他們是香港本土意識下成長的一代。……他們是不會離開香港的，因為對他們來說，他們愛的是香港這樣一個地方，要讓香港變成我心目中所愛的那個樣子。他們有改變的願望和勇氣，也有更加強烈的社會關懷和政治參與。」

嚴飛：

「香港愈來愈多的年輕人，他們逐漸凝聚成各種社會運動的主力，從反高鐵到菜園村抗爭，從民間普選行政長官、反國教再到今日的佔中運動，他們走上街頭，通過各種方式和媒介（包括漫畫、音樂、戲劇、文學、獨立媒體等）積極介入社會議題，並感染著新一波青年人的參與。……年輕一代的香港人，卻愈發樹立出對這個社會自主承擔的立場，重申這是『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是『我城』、『我們的香港』。」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與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ISBN 978-988-13048-5-8



9 789881 304858 >

定價：港幣 \$98 建議上架分類：香港文化



我們的香港

——
訪談這一代香港文化人

嚴飛

代序

改變和尋求改變的下一代

嚴：嚴飛 梁：梁文道

嚴：這本書的主題是關於香港「這一代」的所思所慮，很想知道您對香港的代際劃分持有怎樣的看法？

梁：其實在香港代際劃分這方面，我的想法跟呂大樂、陳冠中沒有太大區別。我幾乎與他們同時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我寫的更多是關於政治方面的，例如香港政壇裏面的代際問題。2009年，政治委任的副局長譚志源出任香港的特首辦公室主任，他當時的年齡是四十五歲。特首辦主任相當於白宮的幕僚長，此後，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在內的香港很多媒體，都評論說他嘅仔，年輕沒經驗，如何能擔此重任。為甚麼一個四十五歲的人做特首辦主任都還說他是嘅仔呢？英國的 David Cameron 當首相的時候也是四十五歲，奧巴馬 2008 年當選總統的時候也不過才四十七歲。而另一方面，我的一些朋友，選議員選了二十年，都快五十歲了，至今仍在做區議員，我覺得香港政壇的老化，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是因為他們上面還有一批人，那批人永遠會得到媒體最多的曝光、最多的關注。這批人可能很年輕的時候就出道了，你不可能期盼這個時候讓他退隱江湖。的確，下一代人的經驗比不過他們，但是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差異呢？因為只有那個年紀的人能夠跟一些社會的官商名流來往。一個區議員只能到茶餐廳，而掌握實權的上一代人說不定在半島、在文華，你出入的場所，你來往接觸的人群是不同的。一個

區議員去找李嘉誠，他是不會理你的，一個立法會議員去他也許會接你的電話。上一代人的確掌握了各行各業的人脈資源，這是年輕人永遠不會有的，年輕人由於一開始就沒有，後來就更不會有，他只能永遠浮沉，永遠不會有處理大問題的經驗。

其實這在香港別的領域也是一樣的。比如說一個媒體人，二三十年前就當了報紙總編輯，現在他還是在當報紙總編輯，也就是像陳冠中所描述的香港的大爆炸階段。其實大陸也會這樣，現在去看大陸的很多報紙、雜誌的總編、社長，很多都是三十多歲。因為它現在正處於大爆炸階段，而香港的大爆炸正好是在二三十年前完成的，那段時期，需要很多空間、機會，上一代人在這樣的時間點上去，掌握了資源和人脈，自然不會輕易的離開。

嚴：在您看來，過去的幾年裏，在香港這一代的年輕人身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梁：這幾年的香港，我看到最正面積極的變化就是香港年青一代很有朝氣，很有希望，儘管他們不知道前途是否樂觀，但他們想改變香港。這是因為「九七」後香港面對過好幾次大規模的政治、經濟危機，比如說「非典」等，這麼多事件，加上香港本土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使得愈來愈多的年輕人開始問香港到底怎麼了？香港是誰的香港？

香港在變，在重新懷疑過去，重新定義甚麼叫做香港。在這個變化的過程裏面，主力就是這群年輕人。他們不再相信過去的成功模式——上一輩的人或者我這代人努力念書，好好工作、努力往上爬，你有機會又聰明總有一天能登上社會最頂端。即使做不了李嘉誠，也可以做李嘉誠之二或其副手之類的。這裏明顯蘊藏著一個社會向上流動的階梯，但現在的年輕人覺得這個階梯並不存在，就算有他也不想遵循這個階梯往上爬。他們覺得你

不可能登上頂端，一種壟斷的差距格局已經形成。

對於政治也是一樣，以前香港的年輕人對政治很冷漠，只想著如何賺錢。但反觀今天香港的年輕人，他們對政治濃厚的參與性卻大過以往任何一代。因此，這些年輕人會有很多橫向的聯結，你也會經常看到現在好多藝術家都在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今天的香港，你從事文化創作就意味著你必須要參加社會運動。

嚴：確實如此。我們看到，這一代的香港年輕人，他們在保衛天星、皇后等諸多社會運動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的心態要比上一代更加開放，也沒有太多行動上的顧慮，對於本土文化情感有一種爆發趨勢。

梁：這一代人，他們特別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是直接受香港意識衝擊的那一幫人，而我們這一代就受到了香港意識的衝擊。所謂香港意識，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香港人開始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開始意識到香港與大陸不同。曾經我們這一代人，覺得香港是最厲害的，除此之外，誰都看不起，甚至連倫敦都不放在眼裏，更不要說大陸了。我們經歷過所謂的香港黃金年代，經濟發展最旺，樓市、股市天天上漲。我們前二、三十年的那代人生活在港英時期，而二十五到三十五歲這一代不一樣，他們所處的時期，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他們對港英殖民地沒有我們那麼強的感情或者是生活經驗。他們長大、工作的時期，已經是香港由盛而衰的階段，其實這幫人更加不應該排斥大陸，因為他們有機會看到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初步成果，或者在文化方面，他們能看到很多大陸的雜誌，比如《城市畫報》，我們當時還只是看《號外》。所以從這層意義上看，這一代人應該比我們更內地化，但最終的結果卻恰恰相反，反而是我們這一代人會經常跑去大陸，他們現在卻更強調本土性。我覺得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也是合乎邏輯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這一

代人，特別是在文化領域，在香港做了十幾、二十幾年甚至更久，覺得已經沒甚麼可以做了，或者做來做去都看不到出路在哪裏，就索性離開香港，或者即使不離開但也不會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香港，但是下一代人呢，他們不是這樣想的。

嚴：是否這一代香港人愈是看到香港與大陸不同的地方，就愈想強調香港的特殊性？

梁：不只如此，他們會反省香港一直以來的邏輯。甚麼叫香港的邏輯呢？譬如說碼頭拆卸，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十多年前就沒甚麼大問題，而保育運動也只是這十年間才流行的，甚至不是十年，是這五年甚至更近的時候。以前想拆就隨便拆，香港就是這樣，為甚麼可以隨便拆？因為拿地蓋樓發展經濟，是天經地義的、很邏輯的一件事。香港的生活方式，不管是經濟、社會還是政治上的，我們那一代人主流上是不會去攻擊、不會懷疑的，我們想發展文化，但是真正要改變這個社會主導邏輯的這種想法卻並不強烈。

我覺得我們這代人大部分是認命的，但是下一代人與我們的區別就在於，他們看到大陸很多地方的東西以後，認為大陸跟香港不一樣，所謂的開放也就在這方面吧。他們會覺得香港人可以有另一種生活方式，有另一種選擇，香港的城市發展邏輯可以有另一條路，此時他們會有一種抱負，即香港要不要改變，應不應該改變，怎麼去改變，並且這種抱負會愈來愈強烈。

我覺得這代人的特別之處就在於，一方面，他們會非常強調本土性地熱愛香港，但另一方面，他們的愛包含著很強烈的改變香港的願望，而這個改變是很徹底很根本的改變。因為這樣的改變是建立在之前他認為「香港是甚麼」這個問題基礎之上的，他們想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他們愛香港，他們是香港本土意識下成長的一代。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不是我這一代和那一代的區別，而是簡單的將香港人分為兩代，一代稱之為移民的一代，一代是不移民的一代。移民一代的特點，是我常常說的九七要來了，他們失去了根。八十年代的時候，香港的媒體曾提出過一個很熱門的討論，提議在外面買一座小島，香港人全都搬到這個島上，後來被人認為太荒謬了，媒體也就不提了；之後，有些人提出移民溫哥華，想辦法把溫哥華變得和香港一樣。溫哥華很像香港的某些區，在那邊可以完全講廣東話、聽廣東歌、吃廣東菜、進茶餐廳。像那一代香港人，就是這樣一種心態，覺得搞不過就跑，他們寧願跑到外地把一個荒地變成香港，也不願意留在這裏。而會移民的那一代人覺得個人的生存、福祉比香港要重要，而不移民的這一代香港人是甚麼樣的呢？他們是不會離開香港的，因為對他們來說，他們愛的是香港這樣一個地方，要讓香港變成我心目中所愛的那個樣子。他們有改變的願望和勇氣，也有更加強烈的社會關懷和政治參與。

嚴：為甚麼這代香港人會有如此深厚的本土化情結？

梁：我們那一批人跟現在這批人，以及你剛剛提到的香港的年輕人，看到香港回歸了，看到大陸很多的東西，會更想瞭解香港獨特的地方在哪裏，甚至包括一種恐懼，怕香港不再是香港，害怕自己沒有特色了。這種恐懼感跟政壇裏面的那些老人捍衛一國兩制是不一樣的。就像香港主流社會那些上了年紀的精英們，他們認為香港要有自己的特色，所以一國兩制很重要，但他們心目中的那種特色是政治、經濟上的特別制度，讓大家得到好處，是比較工具性的。而這一批年輕人眼中所謂的香港特色是一種身份認同的問題，他們不願意在十三億人中被淹沒，這種情況與政治上想獨立或者主體意識不同。就類似於天津人會強調天津跟北京有甚麼區別，杭州人會相對於上海人說我們杭州人是不一樣的，就是這種文化

身份上要給自己一個認同的物件或者團結的情緒，因此這一代香港人會有這樣的表現。

嚴：您又是如何評價這一代香港人與這一代內地人的區別？

梁：我覺得在我所接觸的那麼小的範圍裏面，這一代香港年輕人在行動視野上都比較寬闊。所謂行動視野是指，大陸同時代年輕的文化人，他會覺得我是在寫作這個領域，但他絕對不會碰任何有關社會政治的話題，即使談論社會政治，你也會覺得他不是那麼自如地穿梭、宏觀地看待事情。而香港這一代人比較宏觀一點，這當然是環境使然。例如，我們曾在北京開過一場兩地青年人的研討會，鄧小樺他們都去了，談論的是兩地八十後的社會參與空間。那是一個很有趣的研討會，你發現大陸的很多在場的年輕八十後，跟香港的參與者完全不一樣。大陸那邊的人會談很多個人的苦悶，不受重視，香港這邊上去就會說我們怎樣保衛天星碼頭，我們參與了一個甚麼樣的社會運動，談論的焦點很不一樣。我發現大陸很多八十後的苦悶或者情緒上的困境是很內向的，他把很多社會問題翻譯成個人遭遇的問題，卻忽視了所謂的個人遭遇，其實是一個集體的事情；而香港的年輕人會這麼去思考，個人遭遇其實也是社會結構上的問題。我要尋求改變，不是我個人出人頭地，或者受到重視，而是整個社會需要改變，因此我認為香港這一代八十後看問題比較宏觀一點，他的空間行動視野比較寬闊。

嚴：關於香港的政治發展。2017年即將到來，在您看來，香港未來的政治道路，在今後會有甚麼樣的發展空間？我覺得香港政治有一種依附性，以前依附英國，是英屬殖民地，現在又變成依附於北京，只會抱著阿爺的大腿。

梁：首先，香港人很現實，你不直接動搖他，不直接殺到門口，他寧願妥協，除非你確實像2003年二十三條立法那樣，那是非

常直接的面對面地奪取我們擁有的一種自由，這樣他會反應很強烈，除此以外，他們很願意接受現實。就像現在一樣，我們知道上面已經決定了，你不能再說普選，我們會認命。可是如果現在你跟他說香港不能普選，他們會馬上瘋掉，這就是我所說的香港人受不了被直接拒絕，但是你跟他說會普選，只是會晚一點，他是能夠接受的，這就是香港的主流社會。

至於你剛剛說到的依附問題，這是香港的悲劇。以香港的社會發展程度來講，這個地方早就可以有普選的資格了。可是問題是，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上的一個城市，這個國家今天怎麼能容忍他有這麼一個相當於直轄市或者省的一個地方，直選自己的市長跟市人大代表，這個立法會就相當於人大代表，他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個東西帶來的衝擊會很大，所以我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發展比較悲觀。

民主化離不開大陸的具體變化，在中央看來，你不能比大陸發展的快很多，你快很多，對大陸的影響衝擊太大了，大陸還沒想好要怎麼應對。香港沒有名義打招牌出來的共產黨，沒有黨委，你普選一個有實權的市長，那黨怎麼辦？這個問題將來大陸也要面對，將來普選省長了，省長大還是省委書記大，應該聽省長還是省委書記？省長的民意合法性、認受度都比省委書記高，他為何要聽你省委書記的話，這個黨怎麼去領導國家等，這些問題他都還沒搞好，他怎麼可能讓香港首先去實行普選。另一方面還有所謂的不穩定，如果說這是穩定的軌跡，那不穩定因素就在於香港市民對於民主訴求的壓力。即使普選的時間表已經規劃得很清楚，如果中間做了手腳，就像現在很多人提議說特首普選要先經過中央的篩選等，會提出這種建議就表示他受到了很大的壓力，他不能不給你，但是又不敢給你，只能在中間拉距，這就要看你能承受多大的壓力了。

自序

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

嚴飛

這是誰的城市？上世紀七十年代中，香港作家西西在其經典作品《我城》中曾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2012年9月的香港，如潮水般的青年人齊聚在政府總部前臨時搭建的「公民廣場」上，他們身著黑衫，一起交叉雙手劃出象徵反對的「X」字，用齊心劃一的行動表達出自己對於國民教育的訴求；正當這成了香港這一段時間最響亮的聲音時，我不禁感到好奇，這一代香港年輕人，他們投身社會運動的巨大力量和熱情從何而來——這裏，不是被人們稱作「浮城」，不是被貶喻為「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嗎？為甚麼在他們身上，我卻分明感受到一種由內心迸發出的「這是我的城市，我要參與它的規劃和決策」的決心和行動力。我似乎又重新看到一個充滿了活潑、進取、衝勁、動感和開放的城市，就好像西西在《我城》中所描繪的七十年代的那個香港。

七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充滿著朝氣的城市。在總督麥理浩的社會改革政策之下，港府先後創立了廉政公署整治官員貪污，設勞工署調解勞資糾紛，同時啟動長期建公屋和居者有其屋計劃，以及九年制免費基礎教育，從而打下了香港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而七十年代末內地的改革開放，也及時地解決了香港日漸百物騰貴的困局。社會經濟的急劇發展，相應地帶動出向上流動的機會。年輕人無須憂慮出路，只要肯努力，謙虛學習，就可以很快地在個人事業上取得大發展。在這一個充滿盼望的年代，《我城》裏的阿果努力地修理電話，麥快樂認真地看守公園，儘管這並不是一個童話世界，社會依舊有著各式各樣的問題，他們都覺得

不需擔心，因為他們深信，只要同舟共濟，沒有問題是不可解決的。連電視台的新聞評述員都說：「對於這個世界，你是不必過分擔心的。你害怕石油的危機會把我們陷於能源的絕境嗎，你看看，我們不是安然度過了嗎。你為了水塘的乾涸而驚慌恐懼，認為我們即從此要生活如同沙漠了麼。你看，及時雨就來了。對於這個世界，你無需感到絕望。」

三十多年過去了，跟隨著《我城》這本小說一起在七十年代中期出生，以及之後出生的新一代香港人，卻在很多社會觀察家的筆下，被定義為困惑、失落、感到絕望的一代。由於經濟轉型及資源分配的困頓，今日香港的社會流動日趨僵化甚至停滯，機遇不再信手拈來，過往七十年代個人只要努力拼搏就可以成功的經驗煙消雲散，而香港亦正面臨著「邊緣化」、「下流化」的「中年危機」和政治迷思。《我城》裏的光彩和朝氣不復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徬徨與不安，同舟共濟、包容互諒的香港精神也彷彿成為了書本上的橋段。

但是，2006年的保衛天星碼頭卻是一個轉捩點。那年底，香港政府正式啟動了中環第三期填海工程，曾陪伴香港人一個世紀之多的天星碼頭遭遇清拆。保衛碼頭的年輕人手挽著手，用身體擋在推土機前面。他們通過集會、辯論、出版刊物等形式，呼籲港府重視對承載香港故事之公共空間的保育，以保存香港人共同的集體記憶。他們雖然不停地被警察阻撓、不停地被抬走，不停地被驅趕，卻喚醒了大眾對本土文化的珍視，對守護香港核心價值的訴求。這之後，香港愈來愈多的年輕人，他們逐漸凝聚成各種社會運動的主力，從反高鐵到菜園村抗爭，從民間普選行政長官、反國教再到今日的佔中運動，他們走上街頭，通過各種方式和媒介（包括漫畫、音樂、戲劇、文學、獨立媒體等）積極介入社會議題，並感染著新一波青年人的參與。

西西在《我城》裏曾問：「如果這個炮有一天又轟起來了，你怎樣呢？你會逃走嗎？你會守住這個城嗎？」今日香港，地產集團壟斷並主宰了城市的經濟發展，貧富差距的拉大導致香港逐漸走向M型社會，而日趨明顯的大陸化趨勢也戲劇性地把香港「只是另一個大陸城市」的身份彰顯出來。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年輕一代的香港人，卻愈發樹立出對這個社會自主承擔的立場，重申這是「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是「我城」、「我們的香港」。這樣的轉變，無疑是根植於本土經驗的香港年輕一代對於香港價值的失衡、本土空間的萎縮、主體性被長期貶抑所作的反抗。

在2009年的最後一天，凌晨一點半，油麻地，我坐在周思中的家裏，和朱凱迪聊香港這幾年湧現出的公民抗爭與保育運動。周思中的家裏就好像一個小型的公共圖書室，地上、沙發上、桌椅上都凌亂地堆放著各種書籍，很多都是關於香港本土論述的文論，以及各種理論經典。這批香港青年人的能量，很是讓我感到吃驚。在「我城」的情懷之下，他們會去讀原典，會通過不間斷的寫作來理性地闡述自己的想法，而不像某種作家採取不涉政治的避世姿態。周和朱同時也都是香港「本土行動」的核心成員：他們不僅僅只是書寫者，同時也更有行動欲望、能力和政治視野的行動者，會親自踐行自己的信念，點滴地通過行動改善社會。對照內地同樣年紀的年輕人，似乎很難找出與之相應的人物。在社會轉型的諸多問題面前，我們也會感到焦慮、迷惘、憤怒，但是我們的苦悶都是很內向的，都是從個體的角度出發，在個體上的宣泄。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我們情緒上的困境，其實也是一代人的集體困境，是社會結構上的問題。這也許是因為兩地政治制度和社會環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我輩們似乎缺乏了對「我城」的體認，或者在消極冷漠的接受既有的規制安排，或者在「我國」的光環之下高唱盛世，而難以形構成一個有力的共同體。城市既然讓生活更更好了，大家都在循規蹈矩、各行其是，微微的小小的嗨。

西西的《我城》雖然寫的是香港，但今天再看，其實並不囿於對某一個具體的「城」的懷念與希冀，她也借著阿發的班主任老師之口道出了她的企盼：

「你們既然來了，看見了，知道了，而且你們年輕，你們可以依你們的理想來創造美麗的新世界。」